

EAST

# 国家、战争 与历史发展

## 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赵鼎新——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EAST

国 家 、 战 争  
与 历 史 发 展

前 现 代 中 西 模 式 的 比 较

WEST

赵鼎新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 赵鼎新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8-14695-1

I. ①国… II. ①赵… III. ①历史社会学—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0531 号

##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赵鼎新 著

---

责任编辑 王长刚(chgwang@zju.edu.cn)

封面设计 谢就宇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3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695-1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 自序

本书收集了笔者近十年来写的一些有关历史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心的一个重点是前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性质,以及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社会的到来。本书所收文章在汲取西方学术各种养分的同时,也对从进步史观到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各种西方学术理论展开了批判,并对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兴起作出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解释。通过这些文章,笔者想传达两个观点。

第一,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性。但是,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下。统领了19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进步史观,都是西方人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上

风后产生的狂妄和对历史的误解。前现代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在有着多方面联系的同时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时间性。这些文明之间差别巨大但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先进和落后。非西方国家的精英之所以把西方的一些在进步史观背景下产生的意识形态作为本国发展的行动纲领,其背后原因也只是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有着清楚的输赢,因此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向胜利的一方学习,把自己的文化定义为“落后”,并在被迫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第二,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殤”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他们中有的误把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财富当作中国的强大,不知道中国在创新能力、高端市场的主导能力、关键性技术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与许多国家相比都还有质上的巨大差距;有的以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殊不知中国的成功主要就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的成功,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得以兴起的两大支柱,或者说是现代化的核心。他们中有人甚至产生了很强的带有自大的保守主义情绪,希望中国能回归到某种“传统”。殊不知,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现代化浪潮虽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却有着很大的不可逆性。现代化带来了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导致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手段都将难以为继:臣民一旦成了公民,就自然会产生种种权利要求;女性一旦全面走向社会就不可能再回到男尊女卑时代;一个人群一旦产生了族群意识就很难再把它抹去……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诉求和问题,一个时代必须产生与之相应的家庭关系、社区政治、族群政治和国家政治等。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化给了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一个正面的价值。如果对这一价值所代表的种种欲望控制过强,经济将严重缺乏活力,政治会走向专制,社会也会产生巨大的反弹。

在维持文章原貌的基础上,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收入本书的文章均作了一定的编辑修订,笔者也对《文明竞争中的决定因素》一文作了较大修改。《为韦伯辩护: 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和《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两篇文章有着不同的主旨,在写作时面对的也是不同的对象,但是它们在内容上有着较大的重叠,为了体现文章的原貌,出版社决定同时收录这两篇文章。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一文由我和我的学生徐进共同完成,《为韦伯辩护: 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一文已被《中国学术》录用,其他文章也都在各类报刊发表过,对此文后均作了说明,感谢这些报刊同意将它们收入本书。浙江大学出版社王长刚编辑是本书的倡议者,并在本书的编辑上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没有他的支持和努力,就没有本书,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目 录

中国历史的模式 .....	1
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	3
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时期战争和政治发展 .....	39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	56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	84
阳儒阴法,双面皇帝 .....	92
文明竞争中的决定因素 .....	102
儒法传统与中国崛起 .....	110
欧洲 的 战争 与 国家 .....	119
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	121
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 .....	152
芬纳与统治史研究 .....	163
战争与社会的非期然性“发展” .....	178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	192
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	199
附 录 .....	209
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 .....	211
超越困境和超越的困境 .....	217



# 中国历史的模式



## 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多年来，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Weber, 1951)一直被当做负面意义上的研究出发点。<sup>①</sup> 批评韦伯的人说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了解得非常不够。晚近的学术论著时常把韦伯的不少论点当作欧洲中心论的典型例子而对它们大加批判。例如，韦伯认为，前现代的中国城市缺乏政治上的自治，它们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中心。后来的学者则强调在晚唐至宋代的“中古城市变革”之后，中国城市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Elvin, 1973; Skinner, 1977, pp. 23 - 31);在帝制晚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出现了以商业为导向的大型城市(Johnson, 1993; Skinner, 1977)。又如，韦伯(Weber, 1951, p. 142)曾论断儒学并不提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预言”，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也不具有超验性质。后来学者对这一论点亦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诸如占卜、祈祷和算命等形式的预言性活动在中国特

---

<sup>①</sup> 本文仅讨论西方学术圈对马克斯·韦伯著作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伯的著作在中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一些将中国没有在西方到来之前自发生长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归咎于儒家文化的学者崇拜韦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更是如此。有关中国学者对韦伯的态度的精彩概述，可以参见刘东的文章(刘东, 2001)。

别是在各种民间宗教活动中普遍存在(Brook, 2006);他们指出儒学围绕祖先崇拜而形成的各种仪式和典礼体现的就是它思想超验的一面(Yu, 2005, ch. 1)。在儒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韦伯受到了来自两个不同角度的挑战:(1)有学者批评韦伯对于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评价过于消极,他们认为儒家强调努力工作、家庭、教育、纪律以及节俭的生活方式是东亚四小龙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Berger and Hsiao, 1988;余英时, 1987);(2)至于如何解释早期现代的经济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晚近学者往往忽视韦伯的见解,转而强调促成中国的“失败”和欧洲的“成功”的原因是人口/生态因素,而不是儒家文化(Pomeranz, 2000)。

韦伯的确有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在 20 世纪初,工业资本主义仍然被高度正面评价。韦伯也多少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在解释基督教世界之外为何没有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时,韦伯很自然地提出了一种我们在今天会视之为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此外,韦伯不懂中文,在他写作有关中国的著作的时候所能使用的图书资料肯定也相当有限。因此,从韦伯的作品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中国的了解十分不够。例如,韦伯写道,长城修好之后,虽未阻挡蒙古人的入侵,但“防御和降服蛮族的任务,对政府来说,变简单了”(Weber, 1951, p. 26)。但事实上,在 3 至 6 世纪间和 10 至 13 世纪间的时间里,游牧和半游牧的诸帝国统治着今天中国的大片土地。《左传》中记载,秦穆公(约公元前 659—前 621 年在位)拒绝了两位大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挥师征讨,却遭遇惨败。仅仅依据这条关于秦在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 年)一次军事冒险的重大挫折的简单记载,韦伯(1951, pp. 112 - 113)就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这一战役的失败是中国历史走向和平的一个关键转折。韦伯作出如此评论,说明他显然对于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你死我活的激烈战争缺乏认识。

这里无需进一步举例说明韦伯如何错判或误解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例子简直太多了。然而,在韦伯遭到中国研究专家围攻

之际，我打算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看法，针对上文所总结的一些批评意见，为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的主要见解作出辩护。本文论述的结构如下。

首先，我将指出，韦伯所总结的前现代的中国城市、政治和宗教的特征，本质上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即便他也许并不了解这些特征还有种种变化和特例，但是他的看法仍然有合理的一面，因为就这些议题而言，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往往比中国的内部差异更为显著。因此，尽管韦伯的许多批评者提供了更细致入微的前现代中国的图景，他们并没有颠覆韦伯有关中国和欧洲之间差异的主要结论。

其次，韦伯在他的书中想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正如我刚才所说，他的观点遭到了晚近学者的批评或轻视。但我认为，即便以我们目前对中国的认知，轻率地无视韦伯的洞见可能会导致我们犯更多的错误，而不是收获更多。

在本文的最后一节里，我将转向建设性的讨论，来说明韦伯对今天的学术仍具有很大意义。我将遵循韦伯对宗教、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洞见，来分析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历史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 一、案例之间的差异与案例内部的差异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或明或暗地将中国与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作比较。换句话说，此书中的大部分论证是带比较性质的。

当韦伯（1951, p. 145）在说中国对儒教之外的宗教相当宽容时，他可能并不知道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和唐朝出现的灭佛运动，以及明清时期对于民间教派的打压（Naquin, 1981; Overmyer, 1976; Perry, 2002, ch. 3）。然而，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不足并不

一定导致他的观点错误,因为韦伯脑子里充满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前的欧洲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和冲突,这种状况显然在中国是没有的。换句话说,韦伯的论点仍然站得住脚:虽然中国政府对儒教之外的宗教态度时有变化,但当与欧洲的情况作比较时,它仍然显示出自身清晰而独特的模式。此外,当韦伯(1951, pp. 114 - 115, 169 - 170)提出儒家思想本质上崇尚和平、儒教国家为“一个和平的帝国”时,可能他并不太了解中华帝国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开疆扩土的军事远征(Di Cosmo, 1999; Fairbank, 1968; Hostetler, 2001; Jagchid and Symons, 1989)。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三点,那么,我们也许愿意承认中国文化崇尚和平主义这一观点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与其他世界帝国相比,大部分时间里,统治儒教帝国的是一个文官阶层,而武将不在政治的中心;第二,中国大多数的朝代(特别是那些由汉人创立的朝代)一旦渡过最初的动荡期即迅速转为内敛自守;第三,与大多数其他世界帝国不同的是,中国帝国在北方的领土扩张主要不是帝国向北军事扩张,而是吸纳、整合游牧和半游牧的入侵者所带来的新的领土的结果。

韦伯在这一类的论证中所用的逻辑暗合现代统计学的思维。在统计学中,如果我们想判断两组对象的平均值之间的区别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别时,我们首先要计算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数值,然后算出两组对象内部差异的标准值——即标准差,最后用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除以标准差。如果两组对象的样本足够大,所除得的结果就是标准分数。标准分数越大,那么两组间的差异就越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在量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们都知道,比较对象的每一个都存在着内部差异,但他们不会因为内部差异的存在而质疑比较的有效性。然而,在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往往忽略甚至是不懂这种比较的逻辑。因此,每当有人做比较研究时,那些对比较结论不满的人就会提出批评意见,指出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各自内部都存

在着差异。我必须强调，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重视个体的内部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会产生洞见非常容易在宏观比较研究中被忽视。然而，就一个具体的比较问题来说，只要案例内部的差异显著小于案例之间的差异，那么就完全可以强调比较对象在统计意义上是不同的。

本文的开头已经概括了学者们针对韦伯有关中国与欧洲的城市之间、中国与西方的宗教之间差异论的观点所作的批评。现在让我们就此作进一步的阐述。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晚近的研究对中国城市在时空上的变化作了更细致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晚唐和宋代发生了一次“中世纪城市革命”，其标志性的发展包括官市组织的衰败，封闭式坊市制度被打破，在城内和城郊自发出现了传统市场之外的商铺与交易场所，等等(Elvin, 1973; Skinner, 1977, pp. 3 - 31; Twitchett, 1968)。虽然这些对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考察大部分正确，我们仍需看到，经历了这一城市革命之后的中国城市与自治或半自治的前现代欧洲城市相比仍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这些欧洲的城市里，商人借鉴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模式来对城市进行管理，并通过雇佣军和建立商法来维护城市的自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文艺复兴思潮与新教教义才得以滋长，而这些思想又反过来为城市商人输送了维护他们利益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一直是最商业化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城市都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然而，Finnane(1993)、Marmé(1993)以及其他研究晚期中华帝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的学者都承认改朝换代、政治和行政的决策对于这些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在这些研究中，施坚雅提出的六边形的城镇空间分布模型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它说明了在帝制晚期中国市镇的经济起源和经济功能，在此之前，我们对于这些市镇的起源所知甚少(Skinner, 1964—1965)。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施坚雅的模式用于分析地方性的集市最合适，其次是县一级的城镇；至于县级以上的城

市,政治因素对于决定一个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运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总之,尽管晚近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上中国城市的结构和功能是如何变化的新知识,并且这些信息是韦伯的著作乃至其他类似的宏观比较研究所缺乏的,但是,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韦伯的论断。

至于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性质的说法,相关的批评也有失公允。韦伯声称,与世界其他宗教比较而言,儒学不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宗教。然而,余国藩指出儒学中也有超验的成分,体现于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仪和仪式(Yu, 2005, ch. 1)。尽管我不否认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仪和仪式确实展示了一定程度的超验性,但祖先崇拜对于儒家而言,其主要功能是强化现实世界中的伦常等级关系,而不是与一个超验的上帝建立盟约。

韦伯说中国没有出现“具有社会性影响的预言”(Weber, 1951, p. 142),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韦伯的这一说法是针对儒教而言的。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宗教,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教主要关注的是现世伦理而非预言未来。即便我们把中国的其他宗教也考虑进来,我仍认为,因为儒家的主导地位,使得那些预言“太平盛世”的救世宗教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远逊于耶稣的预言在基督教社会或穆罕默德的预言在伊斯兰教社会所发生的社会性影响。

儒教自汉代初步定型时就已经是一个现世的伦理体系,而不是一种超验的宗教。然而,它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也有了一套伦理规范来调整社会中人的生活 and 人际关系,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在

---

<sup>①</sup> 例如,明初,嘉兴地区只有三个县,但是在1429年划分成了七个县。明代的松江府有三个县,而在清代则分成了九个县。这些新县城的兴起全都是国家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而造成的结果(冯贤亮, 2002, ch. 2)。



其相应的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是类似的。唯一的重要区别是，儒生既是“教士”又是国家官员。由于儒教，尤其是其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仪式，满足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宗教追求，其他宗教往往只能在中国社会中承担次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儒家精英）往往比欧洲人更少宗教色彩。这也使得预言性的宗教活动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较弱。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儒教看成是一种宗教的话，它与其他世界宗教相比还有另一独特之处，即它几乎是专为国家的需要而设的。儒教与国家的这种紧密结合使其他宗教无法插足于政治领域。也正因此，中国的统治者并不像欧洲的基督教君主那样担心异端宗教的存在。其他宗教学说只要不被视为煽动叛乱的根源，就能被统治者所容忍而在中国社会获得立足之处。在中华帝国，多种信仰能够共存并且在多方面展开竞争，这跟欧洲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异教甚至基督教内部的不同学说都很少被容忍。在中国社会，尽管道教、佛教以及从道教和佛教中汲取灵感的各种民间信仰和秘密教派，还有伊斯兰教都充斥着各种预言，它们的共存所构成的竞争性关系也意味着每一种预言都不太可能具有基督教欧洲世界里耶稣的预言所拥有的那种社会影响力。

最后，由于宋朝以来儒教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它也开始渗入了其他的宗教信仰，并且促使其他宗教吸收儒家伦理，儒教伦理因此亦成为其他宗教伦理教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现象甚至于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有些宗教简单地照搬儒家的伦理学说作为自己基本的道德戒条（不少是口惠而实不至），而自己则专门从事巫术活动。地方性民间信仰和一些与此关系较为密切的道教仪式专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类宗教活动中，预言主要集中在各式各样的巫术，而不是在宣扬某一宗教教义。考虑到明清以降这类道教仪式活动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普遍性，当韦伯说，“道教仅仅是一个巫师的团体”（Weber 1951, pp. 224 - 225），这并不